

4505/4

河北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五月

前 言

今年是七七事变50周年纪念，为缅怀抗日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也使后世子孙永远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激发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热情与力量，本刊集中选编了以七七事变为主的抗战史料，权作纪念。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我第二十九军坚决还击日军侵犯的枪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在此后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各捐前嫌，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炎黄子孙，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浴血奋战，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终于赢得了100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历史添写了光辉的一页。

本刊这一辑大部属于“三亲”的珍贵史料。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同呼吸，共命运，《抗战的中共》一文以其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关于佟麟阁将军的3篇史料，记述了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生经历与不朽功勋。10篇河北抗战史料，反映了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激于爱国主义的义愤，英勇地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的事迹；其中关于宋哲元、鹿钟麟的史料，如实地记载了二位将军在抗战中不平凡的经历。西安事变、台儿庄大战、淞沪抗战的几篇回忆录或整理史料，则从较为广阔的视野中撷取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英雄之花。《南京大屠杀见闻》与《战时日本见闻录》两篇史料，使读者从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万恶的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目 录

抗战的中共……〔英〕林迈可 著 齐军平 谢胜建 译 (1)

佟麟阁将军传略……熊先煜 熊先觉 (61)
回忆佟麟阁将军……佟泽光 (80)
佟麟阁轶事……张响涛 (88)

丰台、芦沟桥抗战亲历记……戴守义 (92)
宋哲元在芦沟桥事变前后……李诚一 (97)
芦沟桥歼敌记……段丙林 (103)
芦沟桥抗战见闻……唐铁田 (106)
廊坊抗战之经过……李百年 (112)
回忆沧州抗战……费铭勋 (115)
忆正定抗战……王启明 (120)
察南抗日义勇军片断……刘壮飞 (125)
抗战初期鹿钟麟在河北……张知行 梁蔼然 (133)
抗日壮士安德馨……平光军 (148)

风云变幻中的革命洗礼

——西安事变回忆片断……徐瑞林 (154)
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卫队……王凤翔口述 王四方整理 (164)

池峰城将军与台儿庄大捷……王金瑞 (174)
台儿庄战场回忆……胡剑峰 (182)
我参加台儿庄战役的经历……耿九青 (186)
回忆先父任云阁烈士……任文璞 (189)

南京大屠杀见闻.....	耿九青(194)
战时日本见闻录.....	宋迪(197)

抗战的中共

林迈可 著 齐军平 谢胜建 译

回忆国际友人林迈可（代序）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国土沦陷，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为打败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和《抗战的中共》一书的作者林迈可先生曾在边区有过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关心人类的解放事业和争取世界永久和平的斗争，更关心、支持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林迈可先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又冲破敌人层层封锁，跋山涉水，到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指挥下，与边区广大军民一道，同甘共苦，坚持斗争，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对此，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不忘。

林迈可先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回英国，1975年在英国出版了《抗战的中共》这本书。该书以他在华北亲自拍摄的大量照片和历史的评述，真实具体地反映了中共在华北、在延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过程；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军民深入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动人情景。特别是林迈可先生以忘我的、无畏的精神，亲临战争前线，在激烈战斗的硝烟烽火中，拍摄了大量极其珍贵的

历史照片，向世界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抗日斗争，为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认识当年的战争生活，提供了宝贵的、难得的资料，对青年一代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无庸讳言，这本书也掺杂了林迈可先生本人的某些观点，希望读者根据当时我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鉴别，以取得教益。

以上这篇短文，也算是这部译作的一个序言，一方面回忆过去的老友，一方面将此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臧伯平

1985年1月于北京

英文原版书中作者简介

林迈可（迈可·林赛——勃克的贵族林赛）生于1909年，是前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院长阿·德·林赛的长子。他继承了由克莱门特·爱特利于1945年授予他父亲的贵族称号。

林迈可就学于格莱山姆学校、霍尔特学院和贝利尔学院，在贝利尔学院，他获得了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的学位。离开牛津后，他任教于南威尔士的工人教育协会班，是南威尔士工业测量区副主任。

林迈可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来到中国，在北京近郊的用美国基金建立的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业余无线电技师和机械师，可以帮助中国抗日的团体，如果对方提供制造无线电所需的部件。1938年和1939年，他利用假期到前线地区旅

行，为游击队组织的工作所打动。1941年，他与他的一个学生李致黎结婚。日美两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后，燕京大学失去了其治外法权的地位，林迈可一家在日本政策生效前几分钟逃出校园，险些被困。他们遇到了为他们提供过无线电部件的游击队组织，被带到了肖克将军的司令部。

从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担任聂荣臻将军（现在的聂元帅）领导下的晋察冀军区通讯处的技术顾问。在此期间，他为该军区重修了大部分无线电设备，并轮训了晋察冀根据地几乎全部的具备一定的数学知识，从他的课程中获益匪浅的电台机务人员。

到1944年，林迈可感到中共抗日地区的与世几乎完全隔绝的状况不利于盟国战争力量，于是他搬到了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设法与英国或美国的组织建立联系。林迈可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女儿，经常在荒山地区整夜地徒步行军。在延安，林迈可任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设计并监造了一架功率可发射到旧金山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任新华社英文部的顾问。他在那里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国现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毛的第三位夫人江青。

1945年11月，林迈可夫妇及两个孩子返回英国。1946年到1947年，他是哈佛大学的客座讲师，此时，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了一篇论中国共产党地区教育的报告。1948年，他任赫尔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师。1951年，他任教于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59年成为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学远东研究教授。他写过几部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

伦敦伯格斯特罗姆和波义尔图书有限公司 1975

一些作家说毛泽东留恋他在延安度过的那个时期，这并不无道理。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成功的一个时期，确实可以被称作中国共产主义的英雄时期。他们从1937年开始控制一个大约有100万人口和8万军队的地区，而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们控制了将近1亿人口和90万军队的地区。

关于延安及其周围的县和陕甘宁边区，已有过很多记述，人们还能够找到一些材料，说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西北地区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位于西北地区，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完全是由此向东、向南发展的。至1938年，共产党新开辟的根据地的人口已经超过了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天，我打算弄清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人口中心，估计是在延安东南方向大约500英里的冀南或鲁西。如果除去满洲，把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称为“东北”更为确切些。

延安地区非常重要，因为日本军队从来没有侵入过黄河西部地区。这样，除了1938年初延安老城区遭受过日机轰炸外，陕甘宁边区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而共产党的其他地区则经常受到战争的洗劫，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都遭到日本人的破坏。因此，延安作为军事组织中心是很适宜的。把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有些象美国的哥伦比亚区或澳大利亚的首都地区，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拥有中心组织。

我的旅行大部分是在晋察冀边区，这是共产党的最大的边区之一，有大约2500万人口，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最早建立的根据地，还是唯一的作为战时特别行政区而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地区。特别行政区相当于省级政府。直到1943年末，晋察冀边区始终有一个公开的行使职责的国民党组织，边区的平民政府中包括几位国民党成员。晋察冀边区的组织与发展，在即将出版的卡尔·阿多丽丝著的书里（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有所论述。该书作者论证，中共的一些重要的战时政策最先都是在那里制定的。

在战争条件下，日本人占据的铁路成为华北地区中所有中共控

制区的自然分界线。和平时期作为自然分界线的山峦变成了抗日组织的天然根据地。

铁路成为晋察冀边区大多数地方的边界：北部有北京——大同铁路，东部有北京——石家庄铁路，南部有石家庄——太原铁路，西部有太原——大同铁路。4条铁路所围的地区大部分是荒山农村，几乎没有象样的道路。北京——大同与石家庄——太原这两条路之间从北到南相距180英里，只有一条公路穿过这个地区。这条路象华北的大多数公路一样，仅仅是一窄条为交通而留出来的土地。行驶上一辆小卡车，路面上便没有多少空隙了。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驴车和牛车。那些比较陡峻的山区则根本没有道路，货物只能靠牲口驮载或人工搬运。1939年我们在这样的山区走了大约200英里的路，没有看到一辆有轮子的运载工具。

晋察冀边区包括京汉铁路以东的冀中，这里是坦荡的平原，当然田地之间的高度也有些微错落，其间陷下的道路，出于军事目的，在夏季要靠庄稼特别是高粱——一种能长到10英尺高的庄稼提供遮盖。

冀中比山区在经济上要繁荣发达的多，它是中国主要的棉花生产地，机械纺织工业在这里的一些城市里有了发展。日本人竭力要控制整个华北，至1938年末，他们占领了这里所有的城镇；可是，除了1942年的一个短时期外，共产党的军队一直控制并保持着大部分农村。1942年夏，日本人在冀中进行了一次大扫荡，迫使共产党正规部队撤退到京汉铁路以西的山区。1961年，我在东京遇到一位原来在日军华北军事司令部工作过的前日本军官，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说在1942年9月，日本军官在冀中可以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单独外出。吕正操将军曾告诉我说，那时他损失了将近1/3的地方干部，但是日本人未能把共产党组织彻底破坏。当1943年初日军无力继续实行高压时，共产党的军队又运动了回来。到1945年，来自延安的美军观察小组便可以访问冀中了。

晋察冀边区还包括冀、热、辽边境地区，虽然这里不是一个正

规的根据地。北平——天津铁路以北的冀东，在1935年作为“冀东自治区”被日本人有效地控制着。1938年7月，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冀东，掀起了全面的抗日斗争。几个星期内，日本人便失去了控制。这个地区是个致命的战略要地，沟通着华北与满洲的种种联系。日本派遣了大批军队去镇压反抗，然后进行严密的控制，使新的反抗运动不易发展。我曾遇到一位在那里工作过的共产党干部，他说，人们甚至不能安生下来把衣服里的虱子弄掉，因为日本宪兵非常频繁地突然地袭击村庄，检查居民的户口，捉拿渗入者。

晋东南是另一个在荒山中的共产党根据地，直到1941年，朱德和彭德怀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而不是在延安。晋南地区则山脉较少，有一些较大的城镇，直到1943年，该地区的控制者是国民党政府军，而不是共产党。

在30年代，国民党政府稳固地改进它的正规军，想尽可能长久地延迟同日本大规模的战争。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这或许是个理智的策略，但从政治上来看，却大可怀疑。国民党政府无法向人民解释它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会鼓励日本军队去攫取想要在中国得到的一切。中国大众目睹国民党政府用妥协和退让来对付日本的侵略，越来越不满。1937年7月7日，是公认的抗日战争开始之日，可是在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战斗仅局限在京津地区，同时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还在继续进行谈判。如果日军能够得到对方更进一步的退让，以加强其在华北的地位，是会很高兴地把1937年7月的战争作为一个“地方事件”来加以解决的。但是蒋介石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了。一位非常忠诚的国民党老党员罗家伦对我说，他担心在此期间会有进一步的退让，当听到蒋介石的一位秘书说蒋决定派遣8个师的兵力进驻河北时，他感到欣慰。蒋的这一行动是与早先与日本签定的条约条款相违背的，这表明国民党政府终于下决心抗战了。

到了8月下旬，战局开始扩展，日军不仅迅速地在华北平原挺进，而且冲破关口侵入了山西。在上海的战斗中，训练有素、装备

精良的国民党政府军抵抗了日军，直到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才被挫败。

1938年初，日军打败了黄河以北的中国正规军，但是直到1938年10月，他们很少能够控制离铁路较远的广大农村。这使共产党人有了机会。1934年末到1936年的长征，是个杰出的军事业绩，然而它属于类似英国历史上敦刻尔克的败军撤退。红军能够设法生存下来是令人叹服的。长征前，共产党的军队在华南、华中共有大约30万人，至长征后的1937年，甚至在征召了当地新兵员之后，总兵力才有4万人，其中3万人在西北根据地，剩下的1万人坚持在华南，后改成了新四军。

1936年，当共产国际的路线由“自下联合路线”改成“自上联合路线”的时候，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谈判，但只是由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内战才有效地停止下来。直到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才和共产党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国民党政府承认西北地区的中共武装力量，称为八路军。八路军拥有3个师的兵力：115师、120师及129师。在华南的红军改称为新四军，拥有原来大约1万人的兵力。（这个时期中共的文件表明，党的领导担心1937年7月开始的战争会作为一个“地方事件”加以解决）。

在抗战初期，有证据表明在中共领导人中，关于军事政策的意见不尽相同。受苏联影响较深的领导人反对进行游击战，而其他领导人一开始就赞成游击战。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分区参谋长告诉我说，他们曾经讨论过向满洲进军的行动。人们曾指望国民党政府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守住华北平原北部的山隘关口，如果这成为事实，华北地区适合游击战的区域就只有热河以及与辽宁接壤的山地了。

事实上，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要求下，八路军开过黄河，去增援山西境内的抵抗。115师在日军向南进犯穿过平型关时，对其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日军于11月份占领了省会太原，

并继续向前推进。这样，就使在晋东北的八路军115师完全为日军占领的铁路包围了；晋东南的129师的东、西、北三面也是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晋西北的120师则处于延安地区黄河的这一边。

由于日本人仅仅掌握着铁路与城镇，大多数农村成为政治真空。过去的地方官员大都随着正规军撤离了，大量的地方抗日组织涌现出来，有些由地方绅士领导，有些由正规军撤退时留下的官员领导，有些则由地方小军阀或各种政治积极分子所领导。共产党人能够向这些抗日组织派出自己的干部，他们具有同装备精良的敌人进行游击战的长期经验，还能为建立较大的组织提供便利条件。

按照1937年9月的统一战线协议，中共答应放弃一些特别政策，如没收地主土地；而以孙中山的原则为基础，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实际上，这种政策比纯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更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关键的土地改革问题上，共产党人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一条法律上，即把地租限制在主要庄稼的37.5%（这条法律国民党直到1949年撤退到台湾之前，从来没有有效地实施过）。在地主的利益尚可容忍的情况下，给了佃户以可观的安全保障。

税务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花费了很长时间来贯彻，然而贯彻的既无效也不公平。所谓无效是因为一大批从租税者那里征收来的东西没有到政府手里；所谓不公平不仅是因为税率递减，而且也因为广泛的偷漏。据估计大约有1/3的土地逃避了土地税的登记，而土地税则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山东的共产党地区在整个抗战期间都保留土地税）。

除了固定的政策外，政府的诚实的服务是赢得大众支持的关键。燕京大学的人们说，在抗战前，如果一个毕业生想到外国留学并且有些政治上的关系可以利用，他需要任一个职务，常常是就任某县县长，这职务大约相当于英国旧时区官员。靠着县长几百美元的岁俸，他能够在供职一年中积攒足够的钱去美国留学。有一个毕

业生当了县长，确实在努力为当地人民谋利益，受感动的百姓为他立碑颂扬功德。要赢得有理由怀疑任何政府的许愿的大众的真正支持，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在各种小型抗日武装和新征兵员中培训有能力的战士也是要花费时间的。在1938年大部分时间里，进行这种培训的条件是具备的。因为这一时期战事不太紧张和残酷，只有一些袭击日军控制的铁路的小规模战斗或是对日军侵袭骚扰农村的抗击。

1938年10月，日本终于开始有目的地企图控制华北农村。然而此时，这个地区的民众已为反抗侵略者而组织起来，还有军队、民兵等不可忽视的战斗武装。到1939年末，日军占据了晋察冀边区所有的县城，只有位于山区深处的阜平县城例外，日军在1938年的一次扫荡中将该县城夷为废墟。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没有被日本人消灭，反而自1938年以来变得越来越强大了。相反，日本人损失惨重，在一次战斗中，日军的一位中将被击毙。

对日本方面来说，长期迟延对华北农村的军事行动是个大错误。1961年我在东京同日本防卫厅历史处的一些官员交谈，他们对此向我作了解释。这些官员曾在满洲和华北服役。当我问到日军为何拖延对华北农村的行动时，他们承认1931年的沈阳事变是日本人策划的，但坚持说1937年7月的芦沟桥事变是出乎预料的。那时他们还没有作好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战的充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军队。事变发生后，他们必须在是对付国民党政府军队还是取得对华北农村的控制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选择了前者，就只剩下第110师来守卫华北的交通线而无暇他顾了。这个解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1938年9月侵占了武汉、广州这华中与华南的两个主要城市后，日本才有能力把大量的军队转移到了华北；着手控制农村。

日本人的另一个主要错误是军纪恶劣。1938年夏天，一位八路军军官对乔治·泰勒教授和我说，在日本没有到过的地方发展抗日组织，是比较困难的；日军侵犯到任何地方，其劫掠、奸淫、不分

青红皂白地杀人的种种暴行都是骇人听闻的，抗日组织就可以得到这些地方群众的全力支持。在延安有人对我说，山西有个地区曾先后经历了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控制，那里的人们总结：“日本人杀人太多，国民党税太多，共产党会太多”。

某些日本官员认识到了他们恶劣的军纪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1939年在冀西的一次战斗中，中共军队攻克了日军的一个团总部，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日军第110师的一位将军写给属下军官的报告，文中说，如果日军不大大改进对民众的纪律，日军将在华失败。可是，他对此无能为力。在1961年我与日本防卫厅历史处的官员谈话时，他们企图说明关于日本人暴虐的说法是共产党的宣传，我指明这种辩解与事实真相相违背，并继续指出关于日军暴虐行为的基本问题似乎是由难以控制的宪兵队引起的。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官员都同意我的看法。宪兵队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警察组织，势力极强大，连一般的日军军官反对它，都没有好下场。宪兵队还极其腐化，深深地卷入大量的毒品交易和种种形式的敲诈勒索中。

日本军队纪律标准的下降是个有趣的话题。在日俄战争时期，所有外国观察家都赞扬日军对待老百姓和战俘的纪律；到了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却是举世震惊、臭名昭著了。

日军纪律标准下降也可以用事实加以说明。参加日俄战争的日本军官出身于武士家庭，有着传统的纪律，这可以说明部分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治军原则的影响，即团结和保持军队的好名声被视为军人的最高德行标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组织却失去力量来控制它的最不值得尊重的成员。有证据清楚地表明，地位很高的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内，从不注意属下冒险者与狂妄者的种种劣迹，也从不愿意对这样或那样的治军谬论表示异议，如强有力的军纪处分会败坏军队的好名声。在一次日军新闻发布会上，驻北平的外国记者带来了有关日军暴虐情况的报告，日军发言人对此的标准

回答是，他们在原则上否认这样的报告，因为报告中列举的行为违背明治时期关于军队纪律的命令。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觉得自身有一种正义感，它是为把亚洲从西方列强手里解放出来而战。从西伯利亚远征开始，军方决策人的目的就不能正大光明地辩解了。如果一个日本军官能够清醒地思考问题，能够把高调的“大东亚新秩序”同日军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作一对照比较的话，他就不可能保持自我尊重了。

在1939年的战事中，日军对中共武装主要采取了包围战略，而中共的主力部队都能有效地脱避开。1940年，日军采取了新的战略。据说，一个将军研究了国民党政府对付中华苏维埃红军的战役的记录，那上面记载着，是碉堡和封锁线战略最后迫使共产党人放弃了在华南的根据地，撤退进行长征。

于是，碉堡和封锁线开始作为日军防护铁路及城镇的办法，扩展开来，逐渐消灭着中共抗日根据地。采取了这样的战略，日军一般不再继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强大的攻势来包围中共主力部队，而是把最大的破坏行动集中到还未被碉堡和封锁线所扼制的地区。日军对这些地区进行颇繁的扫荡，烧毁村庄，杀掉牲畜，掠走粮食衣物，将抓获的居民送到满洲去服苦役。

如同在华南红军时期一样，共产党人对日军的进攻还不具备全面有效地反抗力量。1940年8月，中共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反扫荡。百团大战攻克了许多日军据点，使一些铁路中断。可是这些仅是暂时的胜利，其后几个月内，日军又重新占领了失掉的地方，把碉堡重建得更坚固了。共产党人为了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耗用了储备的大量弹药，其政治动机的另一个解释是：唤起国内舆论反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所扶持的汪精卫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妥协。汪的王朝于1940年3月建立。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开始攻击共产党人不是在同日本人作战，而百团大战会对这些攻击予以有力的驳斥。抗战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相互争论不休。1938年时，统一战线工作搞得相当

有效，鹿钟麟领导的政府军队穿过共产党的根据地去接管冀南，而那一带的农村在春天时是由共产党管辖的。共产党官员用比较尊重的语气称鹿钟麟为真正的爱国者，说他真正希望抗日。可是鹿在带兵打仗上的旧式思想使他不能抵抗1939年日军对冀南进行的残酷的扫荡。共产党人对鹿的部下张荫梧就没有这种尊重，痛斥张是“曲线救国”口号的创始者。“曲线救国”论的实质就是同日本人合作，反对共产党。

有些材料记载说，1941年1月发生的“新四军事变”，表明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崩溃。事实上这只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同室操戈，事变发生后，双方都决定公布于世。国共之间比较严重的冲突开始于1939年。在日军对华北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只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才能防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在这一地区出现麻烦。日军的扫荡迫使中国地方武装转移，由于这些武装各自的军事组织以及施政措施差异很大，他们各自的区域是不可能互换的。不同的政治见解与主张削弱了双方相互的信任，作为国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的叛变使共产党人怀疑国民党政府可能与日本人达成协议；而共产党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则增加了国民党的怀疑：共产党真的被苏联控制着。

到1943年底，国民党军队在黄河北部大量消失。由于国民党政府企图实施的军事组织和国民组织的标准方案不能够抵抗日军连续而沉重的压力，1941年至1943年期间，很多在华北的国民党部队投降了日本，然后编入了汪精卫的亲日组织。一部分国民党部队得以在山东幸存，直至1945年被共产党清除。如果抵抗运动要在与装备精良的强敌相对抗中生存的话，某些切实可行的组织特征是必不可少的，故而国民党的组织很接近共产党的模式。

从1940年末到1943年末，日本人在华北占据优势。中共军队损失了1/4，大量的肥沃土地丧失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日军的碉堡与封锁线，中共抗日根据地被迫进行严厉的经济工作，增加租税。日军碉堡封锁线战略的弱点是对兵力的巨大需求。1943年，日军在中国

构筑了大约 8 万个碉堡，每个碉堡需要配置 20 个人，还不得不广泛地部署兵力物力，准备援助被攻击的碉堡，而且还需要有更多的兵力来参加对抗日根据地的毁灭性战役。这样，许多碉堡就由那些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驻防，使得碉堡网的作战能力大减。共产党人与许多傀儡军队制定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协议。晋察冀边区三分区的黄永胜将军告诉我说，如果对傀儡驻军发动进攻，需要得到他的司令部的批准。

从冀中西行穿过铁路线到达抗日根据地，需要大约 30 英里的夜间行军，通过一条碉堡密布的封锁线。这段路程一般来说不会发生什么对抗，一次一个行军小组报告说途中听到几声枪响，第二天早晨，一个农民捎来了伪军的口信，说昨夜因为有日本人跟着他们，所以不得不开几枪装装样子，希望没有伤着人。我负责的电台小组里的一个学生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他跟着一支部队在冀中活动，部队的机枪坏了，便派遣一个农民到当地伪军驻地，请求借一挺机枪用。伪军们稍事议论后，提出如果在 10 天之内、日本人前来检查之前归还的话，他们就借给一挺。

如果日军能将碉堡封锁线战略多维持几年，如果他们能在所有的碉堡内派遣可以信赖的军队驻守，他们大概可以迫使华北的共产党人转为地下组织和分散在山区的游击队小组。日军在满洲的战略是把人口集中到日本人驻防的筑垒村庄，他们曾消灭了那里的公开的反抗。事实上，1943 年后，当日本人不得不从华北撤出军队来应付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时，他们的整个碉堡系统便开始崩溃了。1943 年 7 月，共产党人在华北仅掌握 2 个县城，即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和晋东南山区的平顺；到 1944 年 7 月，中共掌握了 40 多个县城；而到 1945 年，日本人的势力便回到 1938 年初那样，仅仅控制着铁路线和少数较大城市。

在与前日本军官谈话时，我发现他们对对付共产党武装所作的努力比较自豪。他们乐于争论说，他们比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战术要有效的多。但是，不论怎样，判断中共抗日的情况，任何人都应注